

中西印刷术交会中的误会

苏精

19世纪的初中期,中西开始频繁地接触。陌生的双方各自想象与解释对方的文化,并尝试撷取对方文明产物的好处为己所用,这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在印刷术的领域就曾屡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而且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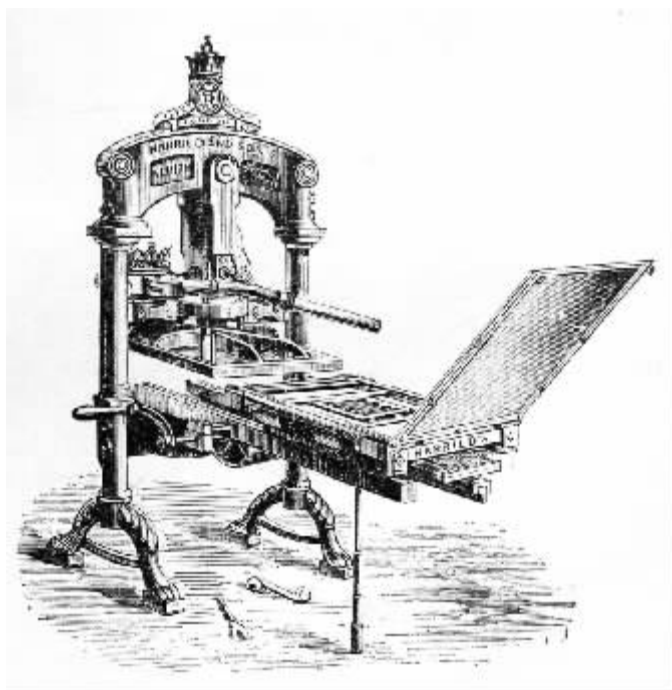
10世纪以后,中国印刷术的主流是木刻印刷,到19世纪依然如此;而西方自15世纪开始印刷直到19世纪,都以活字印刷为主流。西方活字印刷术的三个要素是:铸造的金属活字、垂直压印的印刷机和油性墨;相对于此,中国木刻印刷的要素则是手工雕板、水平刷印的刷子和水性墨。这些不同导致西方活字印刷的技术较为复杂,且成本也较高,但印成的文字整齐划一、墨迹均匀,版面效果较好;木刻印刷的特点则是简便易行,且成本相当低廉,但是手工刻印的字形笔画总有差别出入,也不易掌握水性墨迹的效果。当西式活字在19世纪初中期随着西方势力东来,在中国境内和木刻印刷交会后,就有人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结合这两种技术的好处为一呢?

最早企图结合中西印刷术的人,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他以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十分了解中西印刷术的不同,利玛窦等人都曾在他们的书中谈过,相

较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要铸造几万个中文单字的金属活字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中国无法使用西方的活字印刷术。马礼逊准备来华时,看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许多著作,他应该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但是,他于1807年来华后,面临和天主教传教士非常不同的困境,既无法进入内地,也不能公开传教,便想出替代性的法子,到处散播他称为“无声传教士”的印刷品向华人传教,也因此,印刷出版成为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华的主要传教工具。在马礼逊的带领下,初期的对华基督教传教士尝试过中西多种印刷方式,如木刻、石印、铸版、西式和中式的活字等等,他还自费在澳门(后来迁到广州)经营一家印刷所,使用石印和活字印刷,又进一步想结合中西印刷术为一。

1834年3月24日,马礼逊从澳门写信给在广州的儿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谈论自己结合中西印刷术的想法和试验:

希望你以中文金属活字做个试验,确认能否如同中国人的方式,以手工使用刷子和油墨刷印。……我急于



左图:马礼逊使用的同型印刷机

右图:马礼逊(1782—1834)画像(1826绘)

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欧洲印刷机来印刷中文。

我近来试过以中国刷子刷印,也相信这是相当可行的,随附一份样张给你。

我已订了一些木板以备刻印,……如果你能为我准备一副铁制组版架、一些楔子和一支木槌,就可以组成我旅行印刷用具的一部分,还需要带一点印墨,其他如纸张、刷子在

我几次尝试以油而非水和中国人的印墨混合,他们的水性墨很差。

马礼逊手头是有印刷机的,但是为了便于生产传教印刷品,他试图以中式刷子取代西式印刷机,并以西式油墨取代中式的水墨,再带上其他必要的用品,形成随身携带的一组印刷工具,准备前往各地随时印刷散播。马礼逊自认这种方式可行,也动手尝试,还将

样张寄给马儒翰,要儿子进一步试验。

1834年4月1日,马儒翰回覆父亲,表示将依照吩咐进行尝试。但是,那阵子马儒翰正忙于其他事,在父子接下来的通信中,两人都没有再提到这件事,而马礼逊随即在四个月后的1834年8月1日病故,马儒翰也收拾结束了自

(下转14版) →

← (上接12版)

王朝时期盛行,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纤维织物取而代之。如果把新近露出水面的这块木乃伊外壳碎块视为真品,意味着用废弃纸草制作木乃伊外壳的做法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依然存在。假如坚信这一习俗在罗马帝国时期完全停止,那么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对这块纸草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的理由。

假如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就是说这次发现的萨福的诗是真品,那么它对学者们研究萨福其人及其作品无疑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德国学者认为,萨福在古希腊文学作品由口传向文字形式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萨福把之前由类似吟游诗人唱诵的诗歌转化为更加

耐久和便于记忆的文字形式,不仅为作品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诗歌的格式和音律的固定和完善提供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萨福对自己的诗定将被后人记住和传唱具有信心是有道理的。但是,萨福一定未曾料想,她的诗尘封2500多年以后被今天的人阅读和欣赏,借助的是埃及的木乃伊。这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如果在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审视也不足为奇。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呈直线和在单一层面上完成的。许多学者认为,萨福出生和生长的莱斯沃斯岛在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有的学者甚至相信萨福的名字具有小亚细亚的成分。萨福的诗歌多数是为了陪着里拉琴吟唱而作,并且有伴舞者助兴,这种娱乐形式也有可能来自

小亚细亚,具体说来可能是吕底亚。萨福的诗句中经常出现没药、肉桂、乳香、紫色的长裙、彩虹色的饰件、银杯、象牙器物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小亚细亚和波斯王宫里浓重的节日气氛。

至于萨福的诗歌传播到埃及,主要是得益于亚历山大创办的希腊化世界。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成为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都城,托勒密一世创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收集了当时流传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图书,而且亚历山大的学者们对这些图书进行校勘,使得标准的版本得以诞生,为经典作品的流传、为人们对这些作品进行交流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福的诗产生和传播是早期地中海区域人员交流和文化交融的结果,她的诗依靠埃及的木乃伊躲过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

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萨福的性取向,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曾说,萨福创办了女子学校,不仅教授年轻女子唱歌和跳舞、传授礼仪,而且在情欲方面得到满足。从萨福的诗提到即将结婚的女子和结婚以后离萨福而去的女子的情况看,维拉莫维茨有关萨福教授年轻女子礼仪等的观点站得住脚,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萨福与年轻女子之间的情爱关系。从新发现的萨福的诗可知,她确实描写了女孩子们的身材、皮肤、容貌、舞姿等,不过主要是出于赞赏和羡慕,她一方面感慨自己曾经也拥有过所有这一切,哀叹中年以后把这些珍贵的东西丧失殆尽,同时也希望女孩子珍惜并充分享受眼下的美好时光。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新的碎片的发现缩小了现代人对萨

福这位女诗人及其诗作进行想象的空间。这句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任何有意义的想象都要有其起始点和目的地,正如放风筝一样,风筝飞得再高,也要有绳子牵引,一旦这根绳子断了,风筝就不成其为风筝。从这个角度看,新发现的萨福的诗加固了学者们手中放飞萨福的诗这个风筝的绳子,使得他们在解读萨福的诗作时有根有据。半个多世纪之前,英国学者佩奇曾经预言,萨福的诗不可能再增多,如今看来他过早地下了结论。在预料萨福的诗的命运时,我们似乎更应当相信萨福的话,她在上面提到的祝愿其兄长平安返航的诗中说,人的命运多变和无法预料,正如爱琴海上的天气,风暴过后便清风徐来。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